

公共关系学

中国

上

Public Relations
Theorie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主编 陈先红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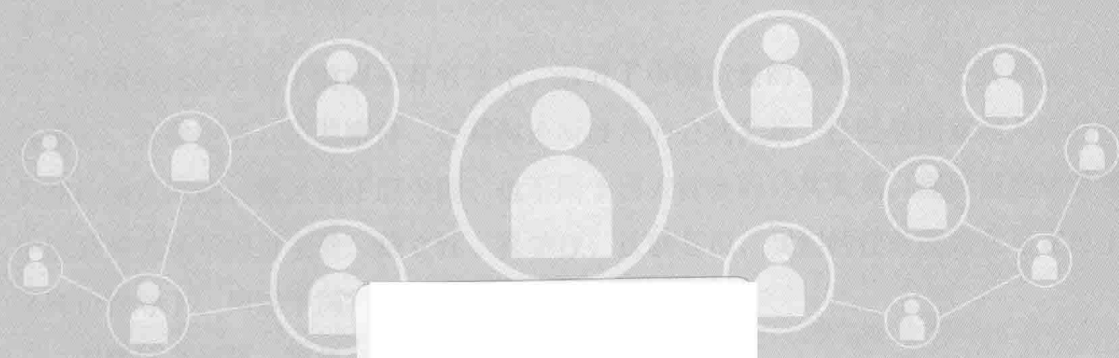
上

Public Relations

Theories for

主编 陈先红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主 编 陈先红

副主编 刘晓程 洪君如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运全 张明新 张 宁

何春晖 陈先红 陈怡如

杨 魁 杨 晨 范 红

胡百精 刘晓程 洪君如

姚 曦 游昌乔

序 一

PREFACE A

发展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学

——为《中国公共关系学》序

马克思曾给人下了一个哲学的定义：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定义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鲜明地指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是孤立的社会存在，都是生活在一定现实的复杂关系中，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爱情等私人关系外，总是受制于社会的公共关系。为谋求公共关系生态的健康和谐，就产生了自觉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进而发展成了一门现代学科——公共关系学。

陈先红教授主编的《中国公共关系学》（上、下册），是国内外六十多名专家学者关于公共关系研究的精彩论文与最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是公共关系理论的基础性工具书。它所汇集的元理论思考、基础研究、方法论和应用研究，视角多元、内容丰富，对公共关系学的学习者、研究者、实践者来说，是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成了中国新型的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公共生活、公共事件、公共舆论所涉及的公共关系，已经是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既区别于旧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公共关系，理所当然地需要中国公共关系学的自主性、独立性、科学性，这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学。

围绕这个问题，我谈一些想法。



一、深化中国特色公共关系理论研究

经过专家学者的多年努力，中国公共关系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教学体系，推出了一些公共关系教科书和专著，推动了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带动了公共关系人才的培养。应该说我们的探索是非常有效的，短短三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公共关系已经从一门“潜学”发展为“显学”，非常难能可贵。但是，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说，我们还处在一个开拓发展的时期，大家所看到的著作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两种缺陷：一种是“有论无学”，集中讨论了公共关系一些环节上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不乏深入见解，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一种是“有学无论”，把不同的学术主张，汇聚成研究成果、研究系列，但是没有学科理论基础来支撑。按照学科形成的惯例和规范，一种开宗立派的学科必须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途径、特定的理论体系，才能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但我们公共关系学科在这个方面还有待提高。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谈谈对深化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看法。

第一，要研究公共权力。公共关系与公共权力联系密切，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要研究公共关系必然要研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实现形式在全球也是多样的：有总统制，像美国，既是总统又是政府，通过全民选举把权力委托给它，这是公共权力的一种委托方式；有议会制，议会可以选举总统可以改组政府，议会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核心；还有半总统半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实际的权力在议会，君主是象征性的）；还有类似过去的苏联方式，以苏维埃的两院制方式授予公共权力的。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授权形式，受全国人民委托来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授权方式不同，决定公共关系构建方式的不同。所以，要在公共权力和公共关系基本框架下研究公共关系的理论，寻找在公共权力之外解决社会关系问题的途径，是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例如，西方的公共关系介入公共权力，而中国的公共关系一般不介入公共权力，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国家公共政策、法律进行公关的组织。

第二，要研究公共利益。公共关系说到底是解决公共利益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划不清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限。而在国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截然分开的，公共利益不涉及私人利益。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位法国总统，他本人有多个女友，有子女，但是他没结婚。然而，法国公民把他看作私人领域的话题，不

把他放在公共领域里看。所以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要是这样一个人放在美国，那肯定是不行的，人们会把总统的私人生活放在公共领域去看。公共关系研究的是公共领域，不是介入私人领域，不然就不叫公共关系了。所以，区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构建公共关系理论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要研究公共意志。通俗地说，公共意志就是我们的共识。公共意志这个概念是由早期社会理论家卢梭提出来的，他认为，未来社会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公共意志，它是维系社会公共关系的最高的精神支柱。一个社会想要维系一个正常的关系，必须注重公共意志。但事实上，这种公共意志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社会要达成完全一致的公共意志是做不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做不到。我们中国今天也难以做到——从我们的两大舆论圈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主流媒体代表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传播主流信息，形成了一个舆论圈，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力；而另一个舆论圈主要由新媒体构成，特别是互联网、微博、微信和移动终端所传播的信息，大多以放大负面信息为主。这两大舆论圈说明社会统一意志是难以形成的，而各种矛盾、冲突、对立也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今天广泛热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问题，核心价值观到底该怎么构建，怎么样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这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现在的核心价值观表述有国家的，有社会的，有个人的，有西方的，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混在一起，因此有不少人提出批评意见。所以，公共关系研究要注意当前的公共意志问题，它不是统一的意志，而是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组织、不同层次的需求所能认同的那一部分共同意志。

第四，要研究公共行为。公共关系是一个很重视实践的学科，研究公共行为发生发展的规律能够为公共关系工作提供可靠的基础。在构建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公共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尤其是社会后果，类似我们在新闻传播里面提到的“社会效益”问题。新闻传播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忽视新闻传播后的社会效果。相当多的媒体，从它本意上来说，遵循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及时客观报道也没问题，但是却可能产生始料不及、甚至相反的社会效果，这常常是失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强调要加强新闻传播舆论导向的调控，这种调控主要不是调控每一件具体新闻，而是要调控整个新闻传播的社会后果，这对公共关系理论研究而言是同样适用的。

第五，要研究公共关系组织。研究公共关系的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与政权、经济、宗教、社会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关系，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多，国内在公共



关系组织研究管理方面还不太够。总体上说,中国社会组织发育还不充分,社会发育不平衡,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改革,放开社会组织发展的闸门,简化审批程序,促进社会组织健康自主发展。公共关系组织也同样面临一个发育发展的问题,怎么建设、怎么发育,怎么样适合中国的社会制度、管理体系和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希望专家学者从理论上提供一些科学的依据,为科学合理地构建中国公共关系组织,提供科学指导。

总之,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公共关系理论思想,又要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一致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这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深化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实践研究

公共关系的事业,是一项关系社会稳定、和谐、正义的科学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从无到有,正在向前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有这样四个问题。

第一,要建立中国特色公共关系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承担公共调节职能的公共关系组织还没有发育起来。现在仅限于部分重要的高等院校,一些重要的城市,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意识到公共关系需要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这是公共关系事业发展的一项基础工作,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和高校公共关系专业方面应加强合作,培养一批公共关系工作的骨干力量,引导中国特色公共关系社会组织的发展。

第二,要培养中国特色公共关系专业人才。从职业安排上讲,国家已经设立了公关师这样一个职业。但是目前,没有多少经过系统教育训练,具备公共关系专业素质,而且能够担负一定社会责任的公共关系专业人才,尤其是国际公关人才更加缺乏。西方国家处理国内突发事件或国际危机事件,都有一大批公共关系组织、有一批包括国家政要在内的人才去承担,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人才队伍的培养是事业发展的一个基础问题,学校应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设立现代公关学科,加大力度培育公共关系专业人才。

第三,要完善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制度规则。公共关系事业要发展,要有一套制度规则。目前,缺乏社会诚信体系等一套制度体系,各个单位、各个企业,管理其产品、形象所进行的各种公关活动,许多都是不太规范、甚至有些混乱。现在之所以产

生那么多谣言、欺诈、敲诈勒索，就是因为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社会诚信体系不解决，公共关系是做不下去的，人们不会信你，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公共关系进入高层社会的协调，诸如国际关系的协调等，更是要有一套制度作为保障，使之有规则地运行，不然就会走偏、出现问题。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乌克兰变局、马航失联以及中国境内各种恐怖暴力事件等，处理危机、化解矛盾，都涉及这一问题。一些国际信息传播颠倒是非，由谣言引导，搞得是非不分，给社会带来了混乱，带来了恐慌和不安定。这说明我们在公共传播领域还缺乏一些基本的制度约束。所以，公共关系事业的健康发展，一定要有制度规则体系来规范，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和谐的推进力量，而不是为了某种利益投机取巧。

第四，要创新中国公共关系运行机制。目前，公共关系运行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尤其在社会矛盾、国际领域，对公共关系这种方法、这种力量的使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在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临时组织一些队伍进行公共关系方面的活动。这个机制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可持续地做这个工作，而不是想起来了、有人要你做事情了，就做一下。所以，我们要探索国家怎么使用公共关系的力量，社会组织怎么使用公共关系的力量，企业、商业市场怎么使用公共关系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间怎么使用公共关系的力量。要建立一些机制，国家有畅通的渠道，公共关系组织也得依法自行运行，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特色公共关系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些只是基础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不走西方发展的老路，努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事业。

三、深化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工作研究

创新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工作不能脱离社会的中心，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也不能脱离中国特色这个实际。中国盛行“拉关系”、“做攻关”，这不是公共关系，而是封建社会留下的依附、人情、裙带关系，公关工作也要与此划清界限。

第一，要增强社会共识。当前，公共关系的重要任务是要传播培育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我们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引领。在人们价值判断个性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情况下，奉



行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会的共识,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是对新闻传播,还是公共关系,这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三中全会《决定》上讲,要围绕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来推进和保障文化改革发展,把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加以强调。平心而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观,对任何事情也都有一个价值判断,这是由你本身的条件、客观环境、职业所在等各方面影响确定的。对国家来说,就需要一个核心的东西来统领多元化的价值判断,更高层次上提升我们的核心价值。这显然是公共关系、新闻传播、文化传播方面最主要的问题。

目前来说,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什么是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提出一些基本框架和基本表述引导人们向这个方向发展。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内在的、灵魂上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强制人们形成一个怎样的价值观,而是要引导大家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培养出信仰和信念,上升为价值判断,增强社会共识,求得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使大家能够在一个基础上去说话、去判断,逐步形成当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既有西方的也有自身的、既有共同的也有特色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多媒体传播下,人们的思想、行为、需求已经是个性化、对象化、分众化,要找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很难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是我们非做不可的,没有这一点,我们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都谈不上。你连一个基本的认同都达不到,你怎么能够自信呢?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要作为公共关系工作的首要任务,贯穿于公共交往、处理突发事件、调解公共矛盾等各个领域,始终致力于传播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共识。

第二,要促进社会和谐。公共关系工作要努力去沟通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期,利益群体分化、社会矛盾复杂、利益观念冲突不断发生,怎样加强沟通,使大家求得共识、增加认同,减少社会前进当中的阻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穷人和富人的关系,这是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现在这个矛盾很激烈;官方和民间产生的一些矛盾,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宁信民间的、不信官方的,这种网络情绪有时相当普遍。还有一些群体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及时调节,像2.8亿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已经是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和他们的父辈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既没有农村的经历,也难以像父辈那样在城市里任劳任怨的工作,回不去农村也很难融入城市,而在城市里经历的歧视和不公平,会给他们心理上造成很大的

阴影。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情绪，都是社会要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些年，在一些工厂发生诸如跳楼自杀等问题的基本都是这一代的人，问题还不够严重吗？我们不但要在政策上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保障他们在城市里能接受义务教育、能治病，打通城乡社保；做到消除隔阂，释放情绪。这就需要媒介和公共关系的沟通和化解，通过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沟通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见，求得一个更大的共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三，要调节利益纷争。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调解纷争，也是公共关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纷争，比如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发期。最近发生的几起医患纠纷事件，社会影响非常不好。现在医患纠纷仅仅靠派出所民警调节不是办法，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单位都变成一个警察式的管理方式。这不可能，也不科学。这种类似医患纠纷的公共关系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当事者解决不了，必须由中介来介入调解、解决矛盾。现在一些县乡政府成立了这样的公共机构，实际上就是用公共关系来解决矛盾。我们公共关系工作要在这方面承担职责，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第四，要做好危机公关。危机公关非常重要。比如马航事件中，我们有大量的心理工作者介入这个工作，去稳定家属及相关人员的情绪。因为马航失踪没有揭露，谣言满天飞，引起了大家的心理恐慌，导致家属情绪非常激烈，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那么如何让这些人稳定下来呢？就要靠公共关系专家、心理学专家帮助他们稳定情绪。国际上处理危机问题主要是用公共关系的手段去解决，像战争的危机、双边斗争、多边的冲突，都大量地采取第三方介入、通过公共关系渠道去解决、化解。在类似马航失联、地震灾害等突发事件中，公共关系人员要积极介入、推动矛盾的化解、纠纷的解决。

第五，要建立社会信任。主要是建立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信任。现在，国内很多人看不明白中国的社会关系，有的估计得过分严重，对现存的一些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多，因而产生了不信任。在国际上，也经常可以看到西方的一些分析，看不懂中国社会现在的运行方式，对中国旅游、中国周边关系和中国人的素质等很多问题产生了不信任。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公共关系工作来增加关系双方的共识、形成一致的利益导向，树立中国形象，建立起信任关系。社会信任是巨大的财富，现在国家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就是由于社会信任的程度不够高，这需要公共关系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第六，要传播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传播，是中国公共关系面对全球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共关系工作也将在这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国际经济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际政治上也有了相当的发言权，但整体而言，我们在国际主流社会仍然没有形成正面的、积极的国家形象。过去，我们在国家形象塑造上常常是概念化地向别人说明中国，千方百计地宣传成就、解释疑问，被动地应付国际社会的各种责任，没有形成一个传播中国形象的强大力量，以至于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认同还比较模糊，对中国的定性、判断也是各种各样，对中国的发展走向、未来和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存在种种争议。

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传播国家新形象的问题，改变了过去在国际公共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处理方式，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传播国家新形象的体系。重点是改进传播语言体系，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传播中国的新形象和好声音；改变传媒布局，加强国际公关人才培养，选调懂外语、学新闻的大学生，经过集中专业培训，选派到国外，完善新闻采访网络，加强国际新闻传播能力；整合对外传播力量，在外交使团、驻外机构、援外工程项目都切实担负起传播中国新形象责任的同时，积极发动社会组织通过民间交往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高校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声音，结合援外医疗队伍和援外工程开展中国形象塑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建设国家智库，依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形成一大批中国的智库，研究设计、描绘、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多个层次、多个方面来调动国内的力量来树立国家形象。目前，清华大学正在筹备国家形象研究中心，专门来研究、设计、推广国家形象。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把传播国家形象作为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工作，进入公共关系实践的高端领域。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非常需要发展公共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来支撑我们调节复杂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希望有志于公共关系的事业的专家学者、公关界人士、青年学生 and 行业组织，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求真务实精神，投入到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学的创建事业中来，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柳斌杰（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序 二

PREFACE B

中国公共关系的新里程

值此中国公共关系学界业界回顾30年、迈进新里程的重要历史时刻，由陈先红教授主编、国际国内6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鼎力合作、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公共关系学》一书问世了。全书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上下两册，由元理论的思考、基础理论、方法论和应用研究四大部分构成，是国内首部集大成的奠基性公共关系理论工具书。她为中国公共关系回顾30年、总结30年后再出发，再次航扬起了新的风帆！

农历丙申仲冬之月初六日，西元2016年12月4日，祖国的“东方之珠”——香港，气候温暖宜人，四处绿荫鲜花。笔者有幸应邀参加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PRSC）主办，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精心筹备、隆重举行的“中国公共关系教育30年贡献奖”颁奖典礼，与其他九位公共关系专家一起分别获此殊荣。笔者当场将当年主编出版的国内第一部公共关系学著作——《公共关系学概论》（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仅存的孤本之一作为纪念品赠送给学会时，陈先红会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馈赠并热诚地表示要将其“作为学会的传家宝，代代相传”。会场顿时掌声雷动。笔者的感动也油然而生！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就是整整一代人！当此代际传承之时，刚刚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以下简称学会）作为当前唯一的全国性公共关系学术组织，首当其冲就发起了历时八个多月的“中国公共关系30年贡献奖”评选活动。这凸显了学会的学术地位、学术方向和社会担当，标志着学会将以学术研究为旗帜、理论建构为导向，总结经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带领中国公共关系教育和事业豪情满怀地走上新里程、登上新台阶！

当此世界大动荡、大变局、大调整的年代，未来的中国公共关系向何处去？未来



的公共关系前景如何？我看是大有可为、前途无量！关键是，我们的中国公关人今后如何往前走？往何处下功夫？

30年前，当我们在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决定开展公共关系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平白无故、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形势所迫、被改革开放的大势逼出来的。我们在编写中国第一部公关书的时候，《绪论》第一页的页首语录选用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段话：“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办法。”那就是当时研究的主旨和目的。可以说，中国第一部公关书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逼出来的。30年前，我们勇敢地张开了双臂来面对西方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引进了来自西方的公共关系学原理、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公共关系学著作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3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要面向西方世界而且是某些主要发达国家捍卫经济全球化！开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国首访瑞士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和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分别发表主旨演讲，主要内容之一都在于此。这实际上也给我们新时期的公共关系工作提出了一个最新、最大的任务：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公关、经济公关、文化公关、学术公关、企业公关、媒体公关、网络公关等，“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要想搞好新时期的公共关系工作，使中国的公共关系教育、研究和事业真正豪情满怀地走上新里程、登上新台阶，必须抓两头带中间：

首先是一头，要进一步抓好公共关系应用与实践这一专长的充分发挥和发展。公共关系总的来说，是一门应用学科，这也正是她的实用之处、魅力之处和受欢迎之处。要抓紧研究、深入探讨微信、微博、推特、脸书、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等潜在新媒体、新技术环境带来的公关传播新课题；要抓紧研究、深入探讨新媒体、新技术环境下的受众、公众新特点；要抓紧研究、深入探讨政治公关、经济公关、文化公关、学术公关、企业公关、媒体公关、网络公关等专业领域公关的新规律，以便真正能为企业、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切实有效的公关解决方案。新时期国内的供给侧改革和国际上的“一带一路”建设，都为公共关系的应用实践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课题，值得我国广大公共关系工作者倾尽全力去研究、去探

讨、去实践。

其次是另一头，要进一步抓好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和框架建设。这方面，既不能简单全盘照搬国外的，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要建立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我们在编写第一本公关书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充分注意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课题组一开始就兵分五路到全国进行了公共关系萌芽的国情调查，并据此初步探索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但是，遗憾的是，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不但没有继续强化而是相当弱化了。陈先红教授感叹：中国公共关系学界充满着“美国腔的学术声音”，这是值得注意的。不过，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先红教授本人和其他学者一起，在此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提升中国公共关系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性、本土性，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构想和论证。例如，她提出的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公众关系（Public Relationships）、生态网络（Ecological Network）是公共关系的三种研究视域理论，立足国际视野、扎根中国本土、参与社会变革，建构中国公共关系理论主体性的路径等，都是很有创见的，值得继续下大功夫持久地进行下去。

第三是带中间，就是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公共关系的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将公共关系理论和公共关系实践联系起来、贯通起来，不至于出现理论、实践两张皮的现象。传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实地（也称田野）调查法、室内试验法等，再加上新兴的大数据、云计算法等，都可以在公共关系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我们的公共关系工作者还应该努力在实践中摸索、理论中探索出一些适用于公共关系领域的特定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使我们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体系更加充实完备起来。

这次在参加颁奖大会期间，还有幸参加了同期举办的学会首届公共关系学术年会、第九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第六届公关业界金旗奖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亲眼看到国内外公共关系领域专家齐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精彩论文纷呈，甚感欣喜。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此。公关同人们，共同努力吧，以《中国公共关系学》为新台阶，在中国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取得有创新、有实效的新成果，为新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明安香

2017年7月8日于北京

前 言

FOREWORD

公共关系学的想象：视域·理论·方法

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社会科学，现代公共关系学历经百年的实践，终于发展为一门经世致用的“显学”。现代公共关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斯提出，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搞好关系，为了公共利益”。但时至今日，这一共识始终未能达成，公共关系学科的正当性遭受质疑，学科边界始终模糊不清。公共关系真的如哈贝马斯所说，是导致媒体丧失公共领域的一股封建势力？^①还是如格鲁尼格所说，公共关系帮助组织创造并维持了权力与宰制的结构？^②抑或如其他公关学者所说，公共关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社会倡导者？^③公共关系不是当前盛行的宣传、说服与操作，而是足以帮助创造社群感的互动合作与公共传播技术？^④公共关系是协商民主的一个规范模型？^⑤公共关系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提升了社会资本？^⑥公关学者们一方面殚精竭虑地提出各种具有创见性的公共关系定义，企图规范公共关系知识体系，划出清晰的学科边界，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关系定义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又使得建立公共关系共识的目标遥遥无期，这虽然充分证明了公共关系学术研究的活跃程度，但也带来了公共关系学科发展的集体焦虑：

①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30.

② GRUNIG J E. Image and substance: from symbolic to behavioral relationships [J]. Publications Review, 1993, Summer(19): 121-139.

③ EDWARDS B.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M]. S.I.: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3-25.

④ STARCK K.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ty: a reconstruced theory [M]. New York: Praeger, 1988: 12.

⑤ LEE E. The Role of Public Relations in Deliberative System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66(1): 60-81.

⑥ MAUREEN T. Cultural variance as a challenge to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Coca-Cola scare in Europe [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0, 26(3): 277-293.



公共关系有“学”吗？公共关系学是什么？公共关系学如何想象？如何超越既有公共关系学为企业服务的主流论述，突破公共关系被拘于应用传播学的藩篱，回归公共关系的社会关怀和“公共性”诉求？公共关系领域的主要理论和学术共识是什么？哪些现实问题值得关注？哪些文化视角具有解释力？要系统回答这些问题，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工作。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本像美国《公共关系理论》（Carl Botan, 1989, 2006）^{①②}、《公共关系手册》（Robert Heath, 2011; 2014）^③那样的理论集大成之作，这反映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界迄今未能对公共关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论述，也没能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视野的问题意识，这也难怪在中国公共关系学界充斥着“美国腔的学术声音”。

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研究社会学不只是分析社会现况，还应该指出社会发展的可能方向，以供世人遵循^④。值此中国公共关系学会（PRSC）成立之际，也是中华公共关系学术社群形成之时，本文拟效法米尔斯指引社会学方向的精神，试图提出“公共关系学的想象”，旨在推动大家对公共关系学科的深入讨论和系统思考，激发大家对公共关系“智识品质”的洞察力。

一、公共关系学科的“阈限性”想象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共关系学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和地位，公共关系学科的“正当性危机”，如同其与生俱来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一样，远远超过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2011年，三十而立的中国公共关系学科被迫从新闻传播学科转入公共管理学科，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非常复杂。虽然离不开知识和权力的“共谋”，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科的“忽视”，但是，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本质阙如——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专业精神缺失，知识领域混乱等等，也是导致公关学科被“驱逐”命运的根本原因。黄懿慧曾提出网络公共关

① CARL R. VINCENT H.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I [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 12-14.

② CARL R. VINCENT H.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II [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6: 10-16.

③ ROBERT L H. Handbook of public relations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④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M]. 陈强, 张永强,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23.

系的新概念^①，并梳理出了中国公关学科正当性的五大危机，主要是身份正当性危机、道德正当性危机、共同体分化之危机、学科设置危机以及学术力滞后危机^②。她认为，学术力滞后之危机是阻碍公共关系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深层因素，本文深以为然。

在20世纪60年代，施拉姆曾用“许多人穿过，很少人逗留”来形容传播学学科基础的认同危机。如果说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那么公共关系学则是处于“之间的空间”的阈限学科。在这里本文想引入“阈限性”（liminality）概念，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公共关系学科的独特本质，重新思考组织与利益攸关者及其环境的互构关系，重新想象公共关系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命题。

“阈限性”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主要来自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研究，和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Turner）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和《象征之林》等著作。所谓阈限性，主要是指“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③。它主要体现在一个仪式的中间阶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教堂、婚礼、旅游、城市广场等，都是具有仪式感的阈限空间。阈限的“之间”和“模糊”特性是文化意义上的，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这些特征可以很好地说明公共关系学科的“之间本质”。

根据“分离—阈限—重合”的阈限阶段理论，一个组织机构首先必须从自身的私领域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叫作“公领域”的“之间的空间”，通过与利益攸关者进行平等性的互动与分享，才能产生“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融合效果，最终实现多重意义价值的“象征之林”。这样的阈限时刻或持续或短暂，但无论多么短暂，阈限时刻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普适的社会联结，它在结构的间隙和边缘出现，却充满了生成的潜能。用特纳的话说，“阈限性充满了力量和潜能，也充满了实验和游戏”^④。也就是说，经由阈限，人们获取共融的体验，这是一个主体性及其公共性得以建设并经历的过程。

由此本文提出，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典型的阈限学科。从历史起源来看，公共关系这一新职业最初是由新闻人创造出来为广告主服务的，它是居于新闻实践与广告实践

① 黄懿慧. 网络科技基于公共关系之使用：挑战、契机与展望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35-240.

② 黄懿慧. 公共关系学科在中国的正当性危机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0-22(003).

③ 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M]. 黄剑波，柳博斌，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④ TURNER, V W.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M]. Chicago: Adline, 1969: 131-140.